

也 谈 雁 足 灯

□ 王 君

“雁足灯”作为一种灯的形制,最早始于汉代,古人认为这种灯属于汉代宫中之物,北宋黄庭坚说:“雁足灯,汉宣帝上林中灯,制度极佳……”,但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一般墓葬也有出土。

《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10日第三版载梁白泉文《何物雁足灯》(以下简称《梁文》),讨论汉代雁足灯,并叙数古代典籍诗文,提出对雁足造型的疑惑;何以要以雁足造型?《梁文》列举了宋朝吕大临《考古图》中的汉灯一件(在这件器物上有铭文为蒲阪首山宫铜雁足八寸灯重六斤永始四年二月工贾庆造);另,上海博物馆馆藏传世品汉灯一件;还有1970年徐州土山二号墓出土汉灯一件,这三件器物一是出于文献资料,二是馆藏文物,三是出土文物,可算资料齐备。我曾对此也有所留意,但未形成想法。鉴于《梁文》的启发,也想发表一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在汉代墓葬出土的遗物中,生活用品大量出现,灯是其中一种,但不多见,灯的造型正如《梁文》指出有人形、羊形、兽形、鸟形、树形,在考古发现中较普遍的是一种盘盏式灯具。雁足灯也是其中一种,但《梁文》唯独对雁足造型发生了兴趣,实属情趣别致。同时,也正如《梁文》所述及,先秦典籍中提到的雁多与灯无关。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鱼上冰,鸿雁来。《吕氏春秋》:孟春之月……鱼上冰……候雁北。“可能是这种不违时令的自然现象,给人造成无限的想象,何以要以雁足造型”,雁,到底能为人做些什么?《汉书·苏武传》: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可能这是凭借鸿雁传书最早的记载,但显然也是当时人编造的故事,并非事实。南朝梁人王僧儒《咏捣衣诗》: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这就把雁足与心意联系到一起了,显然应是以足代身,让人看到的是雁足,而应想到的是雁。还应当注意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尺素,鱼肠,古人把书信写在一尺长的丝织物上即尺素,鱼肠也是代

指书信的,鱼书“书札也。元朝人伊世珍《瑯嬛记》记载:试莺以朝鲜厚繭纸做鲤鱼函,两面俱画鳞甲,腹下令可以藏书,此古人尺素结鱼之遗制也。”明代人顾元庆《夷白斋诗话》:古诗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腹中安得有书,古人以喻隐秘也。鱼,沉潜之物,故云。”唐代韦皋《玉箫诗》: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在古诗当中,此类例证多不胜举:元代诗人宋无《次友人春别诗》:波流云散碧天空,鱼雁沉沉信不通。”这里既提到鱼又提到雁,而诗意却是遥望长天,苦苦等待远方的书信;宋代人戴复古《祖妣题二句于壁续成一律诗》:尹昔天边望蒿砧,天边鱼雁几浮沉。”明代李昌祺的传奇小说《剪灯余话》:鱼沉雁杳,音耗不闻”。都是在说书信断绝的苦处。《辽史·圣宗纪》:燃鱼灯于双溪”。《梁元帝法宝联璧序》:鱼灯夕烂,陈吴之徒晚侍。”这里又提到了鱼灯”。南朝陈人王琰诗:“雁封归飞断,鲤素还流绝”;雁封、鲤素”皆是指书信而言。

另有一些与雁相关的古代词汇都与书信有关:“雁使”是指传书之使,唐代乔知之诗:婉转结蚕书,寂寥无雁使”;雁音”谓音讯,宋代人林景熙诗:寂寞西楼待雁音”;雁信”或雁书”无疑是指书信的;唐代温庭筠诗:若向三湘逢雁信,莫辞千里寄渔翁”;刘孝感诗:雁书犹未返……”;还有:河鱼天雁多消息”;鸿来雁度无消息”等等。在儿行千里母担忧”且交通不便的古代,书信是唯一联系远方亲友间思想感情的渠道。

把雁足比作书信,应是起源于汉昭帝时期,因为在前提到,先秦典籍中未发现把雁与书信联系到一起的例证。《汉书·苏武传》: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

(下转 56 页)

解,对洛阳建都要素的剖析,不仅详尽、辩证地论证了在夏商周时期中原中心地带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而且通过对周公“天下之中”说的全面、深刻解读使亮点更为突出。以往学者对于择都“天下之中”虽有论说,但并不全面。作者和而不同,指出“天下之中”说涵盖了都城选址中自然与社会等综合因素的古代建筑理念,既有地理意义,亦有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天下之中”对于以后中国古代模式的形成存在着很大的关联。作者还从宫城的历史过程阶段特征及其与古都空间形态结构的关系入手,通过全面而又细致的论证,得出了古都最早形态是“非城郭形态”的宫城、也是我国古代城市的最早形态等一系列的新结论。在关于里坊制度与洛阳都城的关系和隋唐洛阳内部存在“四区”和“四区”以上的多种结构,且具有环墙街巷以及小的巷区的研究上也颇有新意;所提出的二里头遗址已设市场,古都形成之初即与“市”结合亦为其新见;“集

中管制市场”与“非集中管制市场”概念的提出更属创见。正是基于系统的新见和严密的论证,作者提出了古都研究的“洛阳模式”;最终归结出: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原型,是奠定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的基础,这一结论必将引起学界的关注。

《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的出版凝聚着作者的心血,作者扎实的文献史料基础、准确的方法论把握和娴熟的研究方法运用,或辨析前人旧说,或提出自己新见,均能考证精当,分析缜密,因而多所创获,体现出作者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其研究成果,一方面丰富了国内外对洛阳城市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现代城市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

(上接 47 页)

使。”看来这个故事还是北方少数民族人编的,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比汉人更深切,以后的在这方面衍生出来的婉约诗文均得益于此。

在《文物》1987年第6期上刊载,20世纪80年代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山西朔县发掘,出土一件汉代铜灯,“雁鱼灯”,高53厘米,是一件完整的雁形,雁作伫立回头状,喙中衔鱼,背部有灯盏,鱼为灯罩,此造型巧妙地将雁、鱼与灯联系在一起,这件器物现藏山西博物院。雁、鱼与书信的关系已很清楚了,那么它到底与灯有何关系?古人认为,灯花可卜

吉凶,愿得好消息叫“灯花卜”;还有“朝占鹊噪,夕卜灯花”之说。《西京杂记》:“灯火花得钱财,乾鹊噪而行人至。”元末明初人郭钰《送远曲》中写道:“归期未定须寄书,误人莫误灯花卜。”雁、鱼“作为书信以及相互思念的象征物应当最早始于汉代。在汉代辞赋中就有相关记载,都是指盼望书信。把雁足做成灯形仍属于盼望书信。以雁足为形或以雁鱼为形,显然是把孤灯独影与思念游子远人联系到一起的,真个叫人“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艺术博物馆)